

從政文鑒

从 政 史 鉴

主 编 罗宏曾

副主编 佟 飞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从政史鉴

罗宏曾 主 编

佟 飞 副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29.75印张 650千字
1989年9月 第1版 1989年9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ISBN7-80563-003-8/K·009

定价 13.90元

顾 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	放	王	辉	吴	廷	璆
杨	志	李	建	张	绍	宗
房	凤	郑	质	黄	炎	智
谢	国	祥				

鉴往知来
古为今用

李瑞琰

九八年春月



序

李瑞环

中国古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饱含着华夏先哲们的无穷智慧，记载了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如何使人类这一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为振兴中华服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责任。

1987年秋，我在《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序言中曾寄语有志于此的专家和学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浩瀚的古文献进行整理选编，按不同专题辑录成书。我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同志们的响应，很快编成《从政史鉴》，出版问世。我国几千年来诸多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乃至“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布衣之士，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论述，政事活动的经验、体会，荟萃一书，既博且精。这本历史教科书，对于一切乐于和善于学习的政治活动

家、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政治工作者和群众社会工作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要重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研究，几次动员、组织若干专家学者投身于此项工作。我所以如此热心于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对历史有什么癖好和偏爱，更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我始终认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具有承继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定阶段。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列宁曾经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历史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就决定了：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历史。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曾经创造过举世无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民族虽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然而却一次再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转危为安，巍然屹立。这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和殉国家之急的爱国的崇高情操，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益。可以说，现实的中国是无数代中华儿女英勇奋斗的结果，是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的积累和文化的积累。因此，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认识现实的中国，而且需要认识历史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决不应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就会在不断重温伟大祖国的光荣史和悲惨史、斗争史和苦难史中，吸取热爱祖国的巨大力量，激发自己作一个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中国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真正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还历来认为，文化遗产作为人

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成果，这就决定了若干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不但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的许多方面，不是某一个阶级所独有的，而是经过不同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共同创造的成果；它也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所服务。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文明遗产的阶级性，又要重视它的承继性和借鉴性。中国历史上下 5000 年，历代王朝交相更替，阶级关系不断变化，但人们在改造自然、治理国家、提高自身素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都可以接受、利用和借鉴的。且不说中国兵、农、医、艺的实用文化，诗骚曲赋的文学精粹，民谚俚俗的熠熠智慧，即使在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成就事业等方面，我们的先辈所提出的许多至理名言，都使后人受益无穷。诸如“正奇互补”、“乱极而治”的朴素辩证法，“民为贵”、“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魂系中华、“爱国如饥渴”的民族凝聚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砥砺品

学、上下求索的进取精神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闪耀着哲理的光辉，其中有些东西一旦赋予新意，便可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那种把所有的历史文明都贴上阶级的标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是“左”的庸俗社会学。

要继承、借鉴好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就要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廓清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的总结，取其精华，剔其糟粕，鉴往而知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对古文化遗产抱残守缺、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而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甚至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把我国悠久的历史斥之为历史“积淀”，视为沉重的“负担”，更是极其有害的。时至今日，许多东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用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文化。相比之下，我们对中国古籍的研究与发掘，倒显得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不是深了而是很浅。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从政史鉴》的编辑成书，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项有益的探索。我为《中国历史

文献精粹大典》的出版曾讲了上述一些看法。这里不烦重复,再次强调,目的在于引起更多同志的重视,期望一切锐志于改革进取的学者专家们投身于这项挖掘古文化遗产的开拓工作。是为序。

写在前面

(一)

在消逝了的历代政坛上，曾经闪耀过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智慧之光。它，净化着人们的灵魂，陶冶着人们的情性，鼓舞着人们的勇气，激励着人们的斗志。

这些政坛上的智慧之光，使江山熠熠生辉，使文献倍添异彩。这些智慧之光，照射过魑魅魍魉的鬼域，荡涤过祸水横流的阴沟。我们赞美它，是因为它给人世带来光华和福音，带来温馨和热情，让人们心中升起希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这些闪闪发亮、永照人寰的智慧之光究竟是什么呢？那是勤奋学习之光、恤民利民之光、尊贤爱才之光、清廉节俭之光、豪情壮志之光、刚直敢言之光、豁达大度之光、不避权贵之光、躬身自省之光、穷且益坚之光、创造财富之光、勇于改革之光……。按照光学原理分析，这些智慧之光是由光的基本粒子——光子（光量子）组成。它们各自具有一定的能量，是光能的最小单位。正是这些难以数计的光子，经过激烈的碰撞，凝聚成那么众多的智慧之光。

政坛，是人间世界中至为重要的一座帅台，它主宰着人间世界的命运，操纵着历史的航船。

对于政坛，理当从不同方位、不同视角去进行观察和分析：从仰视的角度去看，它竟是那样的玄奥神奇，那样的富于

诱惑力，那样的扑朔迷离！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贤能圣哲、志士仁人，为之探索，为之发微，冀求弄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又有多少寒人庶姓、郡守州官，乃至三教九流，在为之折腰，为之拚搏，希望攀登到政坛上去叱咤风云。

然而，倘若我们从俯视角度去进行鸟瞰，又似乎觉得它并不那么莫测高深，而是人间世界的缩影。在那里，活跃着形形色色的诸般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喜怒笑骂，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历史的航船。

假如放大透明的度数，我们还能看到政坛的周围，总是隐隐约约地闪烁着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瑰丽非常的光点，一粒粒，一颗颗，一簇簇，一团团，密密麻麻地围绕着不断旋转的帅台，组成了一圈又一圈色彩绚丽的光环，永远映照着人寰。是的，这应该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希望的山峰，应该是一座能给人们带来光华和福音的帅台。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编写这部《从政史鉴》，就是想通过介绍历代政坛上闪耀着的智慧之光，认清光的本能是照耀，是奉献；并从那些智慧之光中，吸取光华，增长才干。

（二）

执掌或参与政务工作，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它要求“从政者”既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修养，还必须明确“从政”的目的和意义。“从政者”想要使政事得以治理，绝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这要求“从政者”应具备“从政”的基本条件，以及完成职守所须要的才能和手段，以求各项政策、政令得以制定、贯彻和执行。

我国是一个有四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有不少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以及先贤圣哲和志士仁人，不断写出许多有关治国之道、执政准则、用人之方和“从政”艺术等方面的文章，积累了很多“从政”中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这些都值得我们去鉴别、学习和借鉴。

诚然，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王朝帝系的不同，“从政者”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客观环境也千差万别，因而在政坛上表现出错杂纷陈、散漫无章的现象，“从政者”本人的是非功过，也往往由于时过境迁而泾渭不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为甚者，对于某些“从政者”的评价，常常几经反复而争论不休。但是，尽管如此，就“从政者”本身来说，是忠是奸、是善是恶、是贤是愚、是能是否，还是灼然可辨的。那些受到后人崇敬和仰慕的明君、良相和郡守、州官、县令，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些主要方面总有雷同或一致之处。略而言之，他们的表现约有如下数端：

一曰道德品质高尚。

由于他们比较明确“从政”的实际含意，是为了安邦治国，稳定社会秩序，安排人民生活，弘扬良风美俗，因而能够严以律己，自磨自励，清廉为政，不苛于民，待人挚诚守信，行事笃功务实。他们普遍地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礼记·哀公问》）；“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者，莫善乎以道御之。”（《孔子家语·入官》）为此，他们强调要经常责己省身，以检查自己言行的缺失，警惕“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杨时《河南程氏粹言·论学》）他们之所以能在“从政”中做出应有的成绩，良好

的道德品质修养实为第一要素。

二曰志向节义高迈。

大凡在《从政》中以政绩见称的人，莫不少有大志，讲求节操和明于礼义，要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他们不论是从文或习武，出将或入相，即使是官卑职微，难尽人意，位不及九品，俸不足百石，但都有大丈夫的阳刚之气。在出仕期间，他们往往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甚至因而得罪上司，致使慷慨生哀，终生潦倒而丢官罢职。但是，他们认为大丈夫行事应该是：“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王夫之《宋元学案》）他们恪守做人的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在执政者昏昧难明或国家遭受危难的关头，他们敢于挺身而出，犯言直谏，不避权势，马革裹尸，效命沙场，做到文臣谏死，武人请战。他们在年事已高和困顿危厄之时，也能做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在这些人的中，有的人生前纵然遭遇坎坷，但总是为社稷和百姓做过好事，有功于国家和民族，因而死后炳耀千秋，名垂青史，受到后人的崇敬与赞叹。

三曰勤学以求笃实。

事实一再表明，那些有功于社稷的人，无不强调学习的重要，并以经纶满腹、博古通今视为“从政”的要素。他们理解“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集·诫子》）以及“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郑心材《郑敬中摘语》）的真谛，因而学习刻苦用功，“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曹丕《典

论·论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在“从政”过程中，他们不醉心于坐而论道，也不囿于赘语玄言，而是强调身体力行，重视笃功和务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等有益的警语名言，都是这些人行动的主臬。

四曰尊贤而用其才。

在高明的“从政者”看来，人才实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是国家民族赖以繁荣昌盛的保证。因此，他们不仅尊贤、重贤和识贤，而且能够做到举才、用才和显才，还重视育才和选才。墨子说：“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桓谭说：“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利剑，不如得一欧冶”（《桓子新论》）；王符说：“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潜夫论》）这些至理名言，在他们心目中都是极为宝贵的。

在选才和用才方面，高明的“从政者”也总是能够比较全面地处理问题。他们认为：“人不可以求全，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资治通鉴·唐纪》）；“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长中之短，不知人之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魏源《默孤·治篇》）正由于他们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人才，因而力求做到“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王充《论衡》），恪守“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欧阳修《朋党论》）的用人原则。这些尊重贤能思想，以及不以金钱、不以亲故、不以权势去进行选才和用才，正是高明的“从政者”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

另外，就历史全过程而言，在政治舞台上也出现过一些暴君、奸相、酷吏、赃官，他们是国之蠹，民之贼，为人们所不齿和

痛恨。这些佞幸小人、乱臣贼子，欺君罔上，残民瞞下，阴险狡诈，妒贤嫉能。为了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他们拉帮结党，阳奉阴违，挑拨离间，颠倒黑白，弄虚作假，致使英雄路短，生民涂炭，朝纲不振，歪风泛滥。他们虽然得逞于一时，但最终都被推上历史审判台，受到世人的咒骂和后代的唾弃。凡此种种，应为“从政者”戒。

(三)

这部《从政史鉴》涉及的时间范围，上起先秦，下迄“五四”运动以前，内容包括政论、疏奏、名言以及人物事迹等方面，以人物事迹为主。在编排篇章顺序时，我们作了如下的处理，即按“从政之道”、“从政原则”、“从政方略”、“从政修养”、“妇女问政”和“从政禁戒”为先后。这种编排虽然未必尽当，容以后再行修正。

本书稿是在李瑞环同志倡议下撰写的，古代部分基本由罗宏曾撰写并负责审稿，近代部分由佟飞负责审稿，复由罗宏曾对全书进行统修和编定。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又十分紧迫，缺失和谬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原谅。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曾得到王辉、张绍宗、房良钧等同志指导；丁悦陶、于铁丘、王学海、黄玉淑、滕兴成、孙书祥、郭登浩、王同起、汪丹、范大章、张英、米镇波、马越、杨大钧、兰德和、蔡安如等同志，在百忙中为我们写稿；刘富春、赵宝林、李淑萍等同志亦给予协助，谨在这里致以深深谢意。

罗宏曾

1989年7月于天津社会科学院